

大正德谟克拉西的阴影 ——朝鲜半岛在 1919

沙青青

在“三·一运动”之前，中国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，通过突出其日益衰败以至遭吞并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。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“欲兴旧主，力抗强邻，诚见其损，未睹其益。”而这种认知，因“三·一运动”的爆发却有了极大改观。其背后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所言那般成为了“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”。

1918年8月16日，朝日新闻社正式宣布原定于8月14日开幕的“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”在延期两日后，最终不得不取消。在这项日后被称为“甲子园”的日本体育盛事的百年历史上，实属罕见。除了因太平洋战争曾停办四届外，1918年这次是唯一一次因故取消的大会。而取消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各地愈演愈烈的“米骚动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，在经过“战争景气”的高速发展后，日本迎来了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，米价随之水涨船高。执政的寺内正毅内阁却将大部分注意力聚焦于武装干涉苏俄革命的“西伯利亚出兵行动”上，非但未能及时干预市场，相反却大量抢购大米充作远征的军粮。这种火上浇油的行为，无异于引爆了各阶层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。贫苦群众的请愿抗议最早发端于富山县鱼津附近的渔村，不出数日就演变成激烈的暴动，不仅向周边地区蔓延，还在全国各地激起无数响应者。到了8月中下旬，“米骚动”已波及包括东京、大阪在内的1道3府37县，全国参与者规模上百万人。整个混乱的事直到9月中旬才渐平息，寺内正毅为此负责下台。起初，元老权贵们希望敦请“德高望重”的前首相、元老之一的西园寺公望再度出山来收拾局面，却遭拒绝。向来以“自由主义者”自居的西园寺公望转而推荐他长期以来的得力助手、众议院最大党“政友会”的总裁、新闻记者出身的原敬出任新一届首相，进而打破明治以来“藩阀政治”惯例，从此开创符合所谓“宪政之常道”的政党内阁新传统。

1918年9月27日，62岁的原敬奉诏进宫，正式领命组阁。他的新内阁除了陆海军大臣、外务大臣外，全部由政友会成员组成。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届非元老、藩阀主导的“政党内阁”，而原敬本人由于是第一任没有贵族爵位的日本首相又被舆论称为“平民宰相”。为缓解“米骚动”造成的社会动荡，原敬上台后马上就着手修改选

举法，将选举资格从每年纳税10日元的男性，降为每年纳税3日元的男性，使投票人口翻了一番，达到了286万人。同时，对商贸、社会管制等内政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，所谓“大正德谟克拉西”时代由此悄然揭开了序幕。然而，就在“民本主义”在日本国内渐成风潮的这个时代，日本却在殖民地及对外政策上走了另一条歧路。

除了“米骚动”的善后工作外，当时原敬内阁面临的重大事件便是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。在日本人看来，欧洲列强并不在意亚洲问题，由其继承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当然是“顺理成章”的结果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政府还认为之前已强迫中国接受“二十一条”，山东特权早已是其囊中之物。于是乎，将“山东问题”拿到和会上讨论似乎只是一个手续问题，形同“正式过户”以获列强背书同意而已。当时日本派出的谈判总代表便是提携过原敬的西园寺公望。和会期间，除中国因“山东问题”、抵制抗议“二十一条”与日本争锋相对外，欧美列强出于各自利益对日本在远东种种索求也颇有微词，例如美日就曾围绕关岛等太平洋海岛的归属问题爆发过激烈争论。正当原敬内阁全力应对突如其来的“山东问题”并忙于对欧美列强协调之际，已吞并多年的朝鲜爆发了另一场危机。

1919年1月22日凌晨，被迫退位多年、被降为“李太王”的高宗突感不适暴毙，终年68岁。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称其死因为脑溢血，而世人皆持怀疑态度，坊间传说是因为高宗谋划秘密遣使参加巴黎和会谋求复国、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遭日本当局毒杀。巴黎和会前后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“十四点和平原则”，尤其是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内容，对当时韩国各界触动极大，借此国际风潮以复国似乎忽然有一线希望。2月后，大批在日的韩国留学生多次公开集会，

发表演说、散发传单，主张韩国也有权依照巴黎和会的精神来践行“民族自决”的主张。用韩国抗日反殖民运动领导人金九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在巴黎和会上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。由此爆发了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。”金九所说的“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”就是1919年3月1日爆发的“三·一运动”。

高宗暴毙后，根据朝鲜总督府的安排，定于3月3日举行葬礼。于是，自2月后，大批民众从半岛各地涌向京城（现首尔），而主张抗日复国的各方人士也开始加紧准备。3月1日午后，以天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为主的“民族代表33人”在京城塔洞公开集会发表宣言，号召反抗日本殖民统治，集体山呼“万岁”并组织数以万计的民众向停放高宗灵柩的德寿宫游行。此后，不断有大量群众加入队伍，到下午3时已达30万人之多。除京城外，各地同时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游行示威活动，一时间要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风潮席卷了整个半岛。

这场“突如其来”的运动，不仅让日本当局措手不及，还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。当时中国各大报纸都竞相报道最新动态，不仅涉及京城的局势，也事无巨细地报道半岛各地的情况。例如3月14日《申报》就称：“黄州（今朝鲜境内）基督教徒等三百人示威城中广散独立文书，呼高丽独立，警察宪兵以刀剑枪刺驱散之，被拘于受伤者各数人。群众继乃示威警署之前，复被拘及被击伤者若干。人众于署外闻受刑者呼痛之声，于是有人拾石掷碎警署之玻璃窗。”根据事后统计，自3月至5月间，整场运动的参与人数达到205万人，各类反日抗议示威活动超过1500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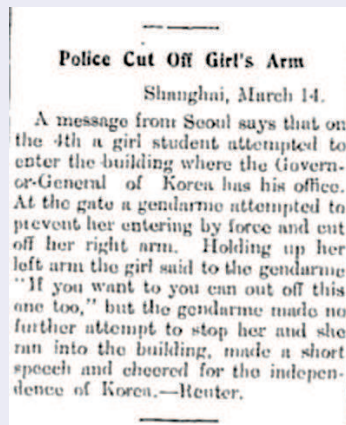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汹涌的抗争风潮，除了驻扎半岛的军警部队外，日本当局还本土调集了大量军警、宪兵增援，而镇压手段同样严酷。《上海泰晤士报》就曾报道3月4日时日本军警为阻止



1919年2月25日《东京朝日新闻》关于留学生抗议活动的报道



1919年3月7日《东京朝日新闻》关于“三·一运动”的报道



1919年3月14日《上海泰晤士报》的报道

韩国学生在总督府门前的抗议活动，甚至砍掉一名韩国女学生的右臂。另根据《北华捷报》的消息，由于相信正在举行的巴黎和会将确保韩国之独立，以至于每天都有民众聚集在京城的法国和美国领事馆前欢呼。为此，时任朝鲜总督、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特别发布告示表示“外间谣传朝鲜之独立已于巴黎之媾和预备会经列国之承认云云，系全无根据之流言”，又声称“朝鲜无关系之民族自决说”，因此相关谣传不可采信。此外，还安排原朝鲜王朝亲日的旧贵族致信巴黎和会，声称“韩人居日本治下

殊为满意”。

在“三·一运动”之前，中国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，通过突出其日益衰败以至遭吞并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。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“欲兴旧主，力抗强邻，诚见其损，未睹其益。”而这种认知，因“三·一运动”的爆发却有了极大改观。目睹运动规模之浩大后，陈独秀在以笔名“只眼”发表的《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》中一改过往的看法，转而称